

一部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演进的全景式著作 ——评曹旭华等著《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史》

喻 梅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史》一书从区域研究层面拓展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丰富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内容。该著通过新颖的历史分期,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全景式地展现了极具特色的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发端与萌芽、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转折与发展的历史,从历史文化角度对当代浙商的崛起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值得一读。

关键词: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史;浙商;书评

中图分类号: F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11)05-0416-03

Panoramic study of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hought in Zhejiang: Review of *History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hought in Zhejiang*

YU Mei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History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hought in Zhejiang* provides an extension view to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economics thought from regional view. And it expands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y thought history. Meanwhile, this book uses new dividing method and comparative method to give a panoramic review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ught of Zhejiang business economy. The research shows the origin and germination of the thought of Zhejiang business economy,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in each stage of evolution.

Key words: history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hought in Zhejiang; Zhejiang merchant; book review

收稿日期: 2011-07-02

作者简介: 喻 梅(1981—),女,甘肃省兰州人,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思想史。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实现了有目共睹的快速稳定发展，而浙江经济发展离不开浙商的锐意进取。因此当代浙商崛起之谜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加以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地缘说、资源贫乏说、产业集聚说及制度变革论等观点^[1-7]。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曹旭华等著《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史》一书从历史文化角度，特别是从浙江地区独特工商经济思想的演进与传承角度，对当代浙商的崛起给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

《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史》一书凡39万字。正文分为3个篇章：第一篇对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形成之前，即先秦至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及历史人文环境进行了考察；第二篇研究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即浙江区域独特的工商思想体系如何依托南宋时期浙江的经济及人文环境成形，又是如何在元明清时期得到了发展与完善；第三篇探讨了这一思想体系形成之后的演化，主要探讨了鸦片战争前后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由注重理论原则的阐述转向概括工商实践活动的经验，而这一思想体系更是在清末至民国时期顺利完成了思想与实践的交融。全书紧扣主题，笔触细腻，徐徐展开了一幅浙商精神发展的历史画卷。

该书系统研究并梳理了上古至1949年浙江籍人士及曾较长时间在浙江为官、讲学、游历的著名人物的工商经济思想，全景式地展现了极具特色的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发端、萌芽、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转折与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区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创新之作。该书的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从区域研究层面拓展了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经济思想内容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建至今，逐渐形成了2种研究体裁，一是通史或断代史著作，二是专题著作。但仅从纵向的时间顺序或是横向的专题角度进行研究局限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野，而该书不仅将时间与专题2个维度加以结合，同时再加上地域这一新维度，从而创新了研究视角，即从区域经济思想史角度展开研究，进而拓展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领域。

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长期占据着经济思想的主流地位，而作者通过史料梳理和比较研究，在主流之外发现了一条清晰可辨又奔涌不止的暗流，即具有十分鲜明重商色彩的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通过区域经济思想研究，作者发现自古以来重商一直是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主旋律，这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如：南宋叶适提出的“抑末厚本，非正论也”的观点，明末清初黄宗羲持有的“工商皆本”的观点，均有力地批判了“重本抑末”思想。这些重商思想虽然从未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也从未被主流思想淹没，它们的存在丰富了重农思想支配下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由于“耻言货利”的深刻影响使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家多从宏观角度给出政策建议，而谈论私人经济为当时中国大多数经济思想家所不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书作者通过区域经济思想这一全新视角，发掘出浙江地区自古有之的“积著之理”“稼穡为先”的治生之道，这些经济思想都从微观经济视角，为私人经济活动出谋划策，体现出浙江工商经济思想体系的民本精神和务实精神，为浙江区域孕育的“民商经济”的商业气质找到了历史脚注。

2 历史分期新颖，完整把握了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演进脉络

该书突破了中国通史的纪年常规，严格遵循浙江区域经济思想自身的历史脉络，将南宋浙东学派尤其是永嘉学派的兴起作为这一经济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由此将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体系形成之前、之时、之后3个大的阶段。作者通过认真梳理史料及仔细甄别，认为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为表征，它发端于远古及先秦时代，在秦汉至北宋时期萌芽发展，在南宋时期形成了体系并在元明清时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在鸦片战争前后发生转折，于清末民初实现了思想与实践的交融，相继崛起了“宁波帮”和“龙游帮”，以至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区域商人群体^{[8][13]}”。

这种根据思想演变脉络进行分期的方法，不仅能够系统整理浙江区域的工商经济思想，还能够使人清晰地了解到浙江区域经济思想的鲜明特色及其历史传承。如作者在考察体系形成之前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发端时探讨了范蠡等人的经济思想。范蠡曾辅佐越王勾践20余载，与齐国的姜太公和管仲的重商思想不同，范蠡的“平籴论”和“积著之理”既关注国家宏观层面又重视微观私经济层面。其他如东汉的王符主张

“(农工商)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魏晋时期傅玄的商人可贱而商业不可废的观点，唐代韩愈也主张农工商并重，都奠定了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重商与尊重民权的基调”^{[8]33}。因此，作者强调这一时期浙江地区涌现的重商经济言论相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农本工商末”的主流思想而言是极富特色的^{[8]100}。而南宋时期浙东学派系统提出了重利、重商、反对抑制兼并、促进货币流通等一系列经济思想，使得“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重视功利与工商经济的特色益发显著”^{[8]170}。作者更是认为清末民初宁波商帮和浙江财团在实践中积累的经营管理思想提升了浙江工商经济思想的境界和水平，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具前瞻性和科学性^{[8]294}。

同时，作者对于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完整性的把握主要体现在不仅研究梳理了上古至 1949 年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演进，而且还研究了这一经济思想对当代浙江精神的深厚影响及当代浙江精神对其传承和发展。作者指出，浙江深厚的工商经济思想与悠久的工商传统交互作用，使得重商思想深深沉淀在这块土地上，根植于一代又一代浙江人的头脑中。当改革开放催生制度变迁后，“这种根植于浙江人思想深处的基因再次发挥作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也催生出了‘新浙商’群体的诞生和成长”^{[8]294}，因而使得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这一历史研究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感。

3 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助于客观衡量和有效解读浙江区域独特的工商经济思想

作者在研究中大量地展开比较研究，在比较分析中归纳出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有别于其他商业文化历史悠久地区的显著特点，即浙江区域工商思想不仅自成体系而且贯通古今、传承有序的发展特色，并且这一思想在实践层面上得到了升华，指导着浙商在近代中国崛起。具体而言，在总结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特点时，作者首先将先秦时期工商经济思想均较发达的浙江地区与齐国进行对比后，归纳出浙江地区经济思想自发端时就具有关注国家经济同时兼顾私人经济的特质^{[8]33}。接着通过与主流经济思想，即“重本抑末”思想的对比，凸显了浙江区域始终传承的重商思想特色。正是基于广泛且严密的比较分析，使得该著对于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特点的总结具有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不仅如此，作者还着重从文化传统、经济管理、资本流向及与政权的关系几个方面考察了近代浙商与晋商、徽商的显著差异，明确了浙商经济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影响下的“民商经济”属性。同时该著还将改革开放以来崛起的新浙商与近代的旧浙商进行了比较，确立了连接新旧浙商的历史文化纽带，即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而将新浙商与近代晋商、徽商进行多方比较后，作者提出“新浙商与晋商、徽商的最大不同是文化传统的不同，由此决定了其商帮性质、产业特征、资本流向及最终命运的不同”^{[8]332}。这一论断再次明确了务实功利、求利求富的民商思想在新旧浙商之间的传承，这种文化传统具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属性，因此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解答了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浙商能够重新崛起，续写辉煌的原因所在。

4 从历史文化角度探究了当代浙商崛起的历史根源

该书作者指出其研究目的之一是“寻求当代浙商崛起的文化动因”^{[8]12}，因而该项研究的目的非常明确。区别于其他学者将当代浙商的崛起归因于地理环境、产业群优势、所有制改革等因素的影响，该书作者以历史的眼光和宽广的研究视野指出这些因素均不是浙江地区所独有的，因而用来解释当代浙商的异军突起似乎不能令人信服。该书通过新旧浙商与晋商、徽商的实证比较研究，支持了马克斯·韦伯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起到决定作用的论断。作者同时注意到有效传承传统文化，需要“文化传统与现世精神有效承接”以实现其“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8]333}，而浙江区域工商思想恰恰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具体来说，新浙商在文化传统、民商属性、企业家精神和产业发展特征方面都对旧浙商进行了传承和发展。而这其中最本质、最重要的表现是对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文化传承，作者认为“唯有源远流长、传承有序的重商思想和经商理念才是浙江独一无二的，这一历史文化因素已形成一种顽固性遗传密码，深深地融入了浙江人的心灵、精神世界中”^{[8]353}，这一论断为解读当代浙商快速崛起之谜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文化支撑。